

西汉的公私藏书与文化繁荣

□ 焦利

大汉帝国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官方藏书已经“积如丘山”，石渠阁、天禄阁等地已经放不下这么多图书了，所以后来又增加了兰台、延阁、广内等多个藏书的地方。是什么原因使得汉朝的图书得到爆发式增长呢？这和官方的重视密切相关，统治者对藏书的重视为中华民族文脉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挟书律》的废除

在这些人中，有两个值得称道的人物，就是刘邦的妻子吕后和她的儿子汉惠帝。作为汉初的传奇性人物，吕后的不少行为与决定，都深刻影响了后世。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和藏书史上，吕后曾经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拯救了无数的珍贵典籍，推动了大汉王朝的文化繁荣。这个决定就是下令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

由于刘邦建立汉朝初期，还要经常亲自带兵出去平叛、打仗，所以无暇顾及制度的修订，基本上就是“汉承秦制”，沿袭秦代的律法。《挟书律》就是秦始皇时期颁布的一项法令，对私藏违禁书籍、谈论诗书的人处以酷刑。这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扼杀了春秋战国以来因“学术下移”而蓬勃发展的民间藏书文化。汉惠帝继位后，在吕后的影响下，文化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在具体的国策中，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就是废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记载：“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意识到《挟书律》的实施实在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不利于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于是西汉政府在皇帝刘盈举行成人礼这天，大赦天下，诏告全国，废除了《挟书律》。

《挟书律》的废除，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阅读，自由传抄复制，自由交换流通。所以以前长期秘藏在民间的古书陆续开始重新现身，公私藏书不断增加，延续千年的官书垄断传

统也彻底终结。至此中国书籍进入公众传播的时代。这为汉代的文化复兴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仅仅是废除《挟书律》，对推动政府藏书，发展国家文化事业力度还是不够的。由于政府尚无专门的制度和机构来保障书籍的收集、校阅、编写和管理等工作，所以政府藏书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而且由于管理不到位，出现了“书缺简脱”等问题。直到汉武帝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广开献书之路

汉武帝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在治国方略上果断放弃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接受了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理念，接受了一系列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文治武功。武功就不说了，文治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央最高学府太学完全把儒家五经作为教学课程，聘请儒学博士担任老师，招收优秀的青年学子当博士弟子。太学有了，老师有了，学生招上来了，课程设计也做好了，汉武帝忽然发现：教材不够！儒家经典严重短缺。我们知道，汉武帝之前官方主要的藏书就是萧何从秦丞相府和御史府收来的那些书籍，但那里面法律、地图、账册之类的书籍居多，儒家典籍很少。吕后和文帝、景帝时期虽然也有民间人士自发给朝廷献书，但毕竟数量有限，远远不能适应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的需要。而且由于没有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没有专门的机构人员管理，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藏书有些甚至损坏了，出现了“书缺简脱”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汉武帝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令“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图书征集活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面向民间大规模收集书籍。

当时的征书活动规模空前，涌现出了许多积极献书的人。现河北省沧州市有个历史名城叫“献县”，就和献书有关。献县这个地方原叫乐成，

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河间王刘德的封地。汉武帝号召全国人民献书，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寻寻觅觅为国求书。只要一听说哪个地方有好书，立马亲自前去，出重金收购，而且买完了还会命人重抄一份留给卖书人。对那些不愿意出让的，则好言好语，耐心请求，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绝大多数是难以做到的，但刘德做到了，他也由此而贤名远扬，众多的读书人和老百姓听说了刘德求书的故事，都带着先祖留下来的旧书，不远千里，前来奉献。就这样，刘德所得之书越来越多，充满楼阁，数量之多，据说“其量可与汉朝等”，和官方藏书不相上下了。刘德收集的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许多都是先秦时期的古文旧书、儒家经典，价值很高。汉武帝时期，刘德多次用车拉着勘校好的《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每次入朝献书，汉武帝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刘德淡泊名利，始终没有卷入诸王争权的政治漩涡，而是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中。他收集整理先秦儒家典籍，为秦始皇焚书后儒家文化的再生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刘德去世后，汉武帝念其献书功劳，于是就把“献”作为谥号赐给刘德，当地人则称之为“献书王”。为了纪念刘德献书，后来人们就把他的封地改称“献县”，这就是“献县”名字的由来。刘德去世后葬于封地之内，现在献县还有献王陵。

西汉官方藏书与《史记》的诞生

在广收天下书籍的同时，汉武帝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就是说不仅鼓励民间献书，而且还制定了官方藏书的办法，专门设立了写书官抄写书籍。因为那会儿还没有印刷术，书籍要复制保存就得有人抄。有许多文献都是在汉武帝至汉宣帝之间这个时期抄写的，应当说和当时“置写书之官”的政策有一定的联系。由于汉武帝的努力，皇家藏书数量大大

增加，堆积如山，使“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且现实中儒术尊而不独，百家罢而不黜，使得百家之学皆得以传承。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汉朝“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太常、太史、博士等专门的官员来管理藏书，相当于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了，太史令司马迁就是其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作为太史令，司马迁的职责是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所以他可以尽情地使用馆中收藏的史料“探采前代”。司马迁能够写出《史记》这样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汉代的官方藏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到汉武帝时，汉宫中的藏书已达13000多卷。面对丰富的藏书，太史令司马迁欢欣鼓舞，由衷感叹：“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百年之间，全国的图书典籍和历史著作都汇集到管理图书的史官司马迁面前。这些丰富的档案典籍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正是因为拥有海量的资源和足够的文献史料支撑，才有了《史记》这样一部皇皇巨著，把中华民族从黄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的历史完整地接续起来，实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不仅如此，汉代由于有了专门的图书管理机构与专职官员，使得图书整理与管理工作走向了正规化，而汉代藏书制度的建立，也为后世藏书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辰、山川丘陵、江河湖海。向自然学习，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才会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和谐。王安石颁布的《农田水利约束》要求众人因地制宜治理，结合实际，广泛调查当地的地貌及水利条件，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提升修建水利工程的技术，形成对治水的客观认识。

在水田治理的过程中，王安石始终尊重客观规律的运行，认为人可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合理地利用自然之物。他写的一首诗很形象地说明了人为的作用在面对自然时的意义：“牛若不穿鼻，岂肯推人磨？马若不络头，随宜而起卧。”牛和马是大自然中的生物，但如果不给牛穿鼻、马套头，牛、马能为人干活？穿牛鼻，络马首就是人在自然面前有所为的结果。这种思想也体现在王安石治水的实践中。人既不能被水旱灾害的发生所吓倒，也不能束手旁观、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集众人之力，通过兴修水利、整理田地、清理淤泥等措施治理河水，防范水旱之灾。

王安石在治理水田的过程中充分了解各地农田水利的实情，依据客观实际，聚集众人之智，将自然之害变为自然之利。如其诗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通过认识事物，同心协力便不惧怕浮云挡住眼前、挡住前路。王安石水田治理的实践不仅对当时农业的生产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为后世带来了长远的收益。



汉武帝刘彻将汉代发展推向了顶峰，实现了“大一统”王朝的鼎盛局面。也正是因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危机。汉武帝晚年极尽奢侈，纵情享乐，造成种种社会积弊，并留给了尚且年幼的少子弗陵和霍光、桑弘羊等一众辅政大臣。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作为深得汉武帝信任的近臣，主政内朝，他坚定拥护轮台诏令，希望转向宽缓施政，与民休息。御史大夫桑弘羊作为外朝领袖手握财经大权，主张继续施行战时政策。内朝与外朝政治立场相异，暗流涌动，双方关注的焦点汇聚于影响力最大的盐铁之策。

自古以来，盐与铁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必需之物，相关政策也是维持国家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汉武帝为讨伐匈奴筹措军费，采用系统的盐铁官营制度，这一举措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但对当时的小农经济却造成较严重影响。公元前82年，霍光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凭借汉昭帝名义，以“问以民所疾苦”为由令郡国举荐民间贤良文学，次年长安参与议政，进行以盐铁政策为中心的辩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数年后，汉宣帝时期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议文成书，名曰《盐铁论》。桓宽虽以“盐铁”命名其书，但“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和政府官员的交锋并不局限于经济政策，围绕盐铁专卖，与各方对汉武帝时期政治、伦理、经济、社会、法律、军事等各方面政策展开朝野论战。《盐铁论》涉猎范围广泛，涵盖内容包罗万象，论辩者在唇枪舌剑中各抒己见，展现了各自的政治策略与治国理念，是西汉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

想要了解《盐铁论》所记录的思想争鸣与论辩价值，需要回溯“盐铁会议”的始终。“盐铁会议”从2月开始至7月结束，耗时5个月，共计60余人参与，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多，自汉初以来是前所未有的。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指品德高尚的有识之士，贤良主要来自三辅、太常选拔而来；文学则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之人，更贴近民间。二者都是汉代察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主要构成，均属于儒生的范围。贤良文学代表儒家的政治立场，为社会平民代言述说，他们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批判桑弘羊等推行的措施，尤其反对盐铁专卖。汉武帝之前，从盐与铁中获利的多为富商大贾，史记中记载“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商人积聚财富以至于影响中央的经济命脉。盐铁专营政策自公元前117年逐步开始推行，十余年后，桑弘羊主政，他进一步推进朝廷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度，将盐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完全掌控于国家手中，不仅解决了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也起到了抑制兼并、削弱豪强的作用。桑弘羊出生于商贾之家，成长在商业发达的大都市洛阳，进宫为侍中，他一直尽心竭力进行经济改革，除推行盐铁官营外还大力推广“均输”制度，建立“平准”机构，力图实现中央财政权的集中。在这场始于盐铁政策的论辩中，桑弘羊是官方一派的主力发言人，就发言次数来看可谓以一敌众，舌战群儒。据相关研究统计，在盐铁会议中，文学发言共123次，贤良共26次，而桑弘羊则发言113次，其他官方代表仅发言10余次。两派之外，盐铁会议促成者霍光的角色同样不能忽视。

桓宽编纂的《盐铁论》采用双方对话、反复论辩的形式记载整理了盐铁会议的全部，共60篇，按照篇目主题分类，会议主要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和军事四个方面。盐铁政策虽是争议的发源，但就《盐铁论》的记录来看，经济问题并未占较多篇幅，双方多用思想意识性质的语言说理，引经据典，侧重经济伦理等原则性内容，呈现了不同政治利益之间的对抗。双方辩论的核心主题是“义利之辨”，即道义和利益的优先性问题。在经济问题上，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述说百姓疾苦，责难豪强官僚的吏治腐败，由此引申出儒家为政以德的吏治原则与思想主张。他们主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将民利与国利区分，引用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呼吁国家让利于民。

桑弘羊等人的反驳着眼于现实政治需要，坚持“务权利”的原则，即肯定国家之利的正当性。在他们看来贤良文学的理论华而不实，无法处理国家的实际问题。执政者关注国家之利，政府追寻利益是实行仁义的基础，治国理政须有强大的物质支撑，因此国家富强必然要集中财政资源。在政治问题上，义与利之争讲出了“德治”与“法治”的一些分歧。在会议中，贤良文学经常采用



“先王”“古者”等言语以批判当下朝政的弊害，向往尧舜仁政，反对严刑峻法，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他们指出与民争利会造成贪鄙的社会风气，强调国家以义为本，崇尚道德教化，才能规范和谐的社会秩序。此外，与匈奴频繁的征战也违背仁义之道，采取厚币和亲施以仁义应对匈奴入侵是消除边境隐患的根本策略。

面对儒生们“崇儒复古”的理想主义，桑弘羊等人持以坚决的反击，提倡变革以满足国家需要，“礼义”无法适应时代变迁，需通过制定严密的法律以控制社会，实行教化。国家应重视刑罚与法令的功效，苛刻残酷的法令能让民众保持畏惧之心不敢犯罪，方能禁奸治乱。边境政策上，桑弘羊一方坚持霸权政治，点明怀柔之策无法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发动战争继续汉武帝的征伐功业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这场激烈的论辩最终以桑弘羊的有限让步结束，但从后续来看，即使进入霍光掌权时期，国家的总体施政并未发生较大变动。盐铁专卖等汉武帝时期的政策一概保留，仅将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并罢免部分铁官。

盐铁会议后，儒生们所提期望没有实现，但贤良文学却因此提高了政治地位，儒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开始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盐铁会议加深了儒学与政治的融合，反映出了儒学在汉代新的发展趋势：儒家的价值观念从思想一步步影响制度和法律的制定，逐步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盐铁会议提供了难得的宏观与微观视角，描绘出不同经济管理观念的交锋。

桓宽虽并未亲身参与这场辩论，但他通过考证收集，凭借自身学术素养在原始议文上增广推衍，最终编纂成《盐铁论》一书。桓宽的记录带有显著的价值倾向，他将自己的态度融入文本之中，表现出对桑弘羊等官方一派的贬抑和对贤良文学的赞扬。即便有着这样的倾向性，但不影响《盐铁论》对经济议题的思想争辩成为研究汉代经济与政治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更是对西汉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剖析，其语言典雅、辞辞华丽，在文学领域也有独特的价值。

近代以来，《盐铁论》的外文译本流传广泛，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德国经济学家波特伦·谢弗德教授是研究《盐铁论》的专家，提出《盐铁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是人们对于经济问题早期认知的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还在北大经济学院做主题讲座“《盐铁论》：经济思想史中的经典著作”。加州大学汉学家李安敦认为，作为从公元前一世纪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古典文著之一，《盐铁论》“提供了极为难得和不可或缺的汉代政治经济踪影”。

